

擺盪於海路之間的國度——台灣歷史地理圖像

台灣自一萬年前米崙亞冰河期與亞洲大陸分離後，即為海島國度。就空間與地緣論之，已非亞洲大陸的邊陲地區，而是游奔於海洋的鯨豚。但自荷治以後制清領的三百餘年間鉅量漢族移民的生活型製、生業方式與集體心態，使得數百年來台灣歷史未能在台灣土地上生根，島[們對自身賴以生存的環境缺乏關心與瞭解，視我們刻意的集體失憶，還是我們缺乏「自我發現」的自覺？視我們遺忘了海洋，還是海洋拋棄了我們？這是歷史詮釋權的問題，也是歷史教育中不容忽視的「自我定位」的課題。

史前時代的台灣原住民存著許多與海洋有關的口碑傳說與始祖故事，如北部、東北部的馬賽人、噶瑪蘭人、哆囉美遠人及加禮宛人的 sanasai 始祖傳說；阿美族的海祭及蘭嶼達悟人的飛魚汛，充溢著與海洋的親密關係。從考古發掘亦知，台灣的先陶時期、新石器時代與鐵器時代之間缺乏連續性，顯見台灣文化發展得自內部分化少，來自東亞第中海世界世界的人群移居與文化傳播影響多。因此不論從遠股傳說與考古發掘都顯示台灣自古即是一個海洋國度。

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西方人梯山縱海，橫渡大洋東來，台灣成為世界航海圖的成員，成為西方海權國家與東方中日等國南漸北進之地，同時也開啓台灣「被殖民」的歷史。十七世紀初荷蘭進佔澎湖，二年後轉戰台灣，隨著荷屬東樣渡公司貿易規模的擴大，台灣被納入世界貿易市場成為荷蘭砂糖與貿易的集散地；西班牙先後在基隆和澮水築成，開拓台灣與新大陸間的海上貿易航線；迨至中葉，顏鄭集團夾期龐大船隊勢力掌握東亞海洋制海權，明鄭政權即是揉合海盜與海商性格的海上王國。

十七世紀晚期，清帝國將台灣納入版圖，確立封山禁海的消極防台政策後，台灣的海洋性格隨著大量閩粵移民來台從事農業開發內縮為清帝國的沿海貿易圈，使得台灣從國際貿易轉口集散地褪色為與大陸的區域分工角色，台灣從世界航海圖上退位，成為中國漢族外延社會，直至十九世紀中葉淡水與安平開港通商，茶、糖與樟腦因市場需求大量出口而片及全球，台灣再度被納入國際貿易體系的一環，中斷近二世紀的海洋性格得以重現。

十九世紀末，台灣被劃入以「殖產興業」的日本殖民統治，殖民政府興辦「基礎工程」，開啓以米糖為中心的產業型態及日本資本主義在世界史上「最後帝國」的特殊地位，導引台灣進入近代資本主義體系並與國際貿易接軌。三零年代台灣成為日本南進華南及南洋的海洋基地角色更加明顯後，至一九四二年總督府首次於台灣舉辦「海之紀念日」活動，廚具有政治宣示意涵外，異服台灣歷史地理之圖像。

二十世紀中葉，台灣與中國陸權關係完全斷裂後，以外貿為導向的海島型經濟特徵重現，此種轉變正說明源自於台灣自古即為東亞地中海島嶼地域成員之一。因此，台灣能否從戎克小船轉化為巨舶，歷史正等著台灣島民能否成功地回應「自我發現」與「自我定位」的挑戰。（中央日報 90/6/14）